

Zhimindi Yindu De Funü

殖民地印度的妇女

陶笑虹 著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Zhimindi Yindu De Funü



殖民地印度的妇女

陶笑虹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殖民地印度的妇女/陶笑虹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622-5158-3

I. ①殖… II. ①陶… III. ①妇女—历史—印度—近现代 IV. ①D443.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9008 号

殖民地印度的妇女

陶笑虹◎ 著

责任编辑:周柏青 责任校对:刘满元 装帧设计:甘英 封面制作:胡灿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280,67863426,67861367(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443 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27.25

版次: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60.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献给我的老师

涂厚善先生
刘继兴先生
杨昌源先生
闵光沛先生

前 言

20 多年前，在先父陶军先生的指引和母亲杨景星老夫人的支持下，我选择了印度历史为研究方向。我母亲的这一支持在她后来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也未曾稍减。

1996 年，承蒙以黄正柏教授为首的历史系大力推荐和学校的支持，我受教育部指派，赴印度德里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学习。在那里，我的导师 Sumit Sarkar 教授在我提交的若干课题方案中，建议我主攻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妇女问题，理由之一是一年时间太短，在此框架内找一题目做，可望有所收获。后来，我在 Sarkar 教授指导下写的《19 世纪孟加拉妇女社会地位和角色的转变》一文在加尔各答历史学会的期刊《孟加拉今昔》(Present and Past of Bengal) 上发表，作为对自己进修一年的一个交代。今天来看，那篇篇幅很长的文章只是一份粗浅的学习心得，却是我研究殖民地印度妇女的开端。就在那一年，我有幸认识了时任印度历史研究理事会主任的 T. R. Sareen 博士，在收集研究资料、提供学术信息等方面得到他不厌其烦的多次帮助。德里大学历史系系主任 K. L. Shrimali 教授则为我德里大学的学术活动和校园生活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2000 年，我应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地域交流企划中心的邀请，赴大阪、东京和京都考察和讲学，得到几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中村平治教授、押川文子教授、内藤雅雄教授、滨口恒夫教授和山本由美子教授的鼎力相助，不仅在与众多学者乃至学生的交流中深受启发，而且在收集各种研究资料上大有收获。其中大部分是经我挑选后应我请求，由柔弱文雅的押川文子教授亲自复制、装订、打包后分三批邮寄而来。这批文献是我除从印度带回的那些外，在后来的研究中最重要资料来源，也是我在 2005 年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的重要依据之一。

教育部研究项目“殖民地印度妇女社会地位和处境的变化”之成功申报，使得该课题的研究及其最终成果的出版有了基本保证。

当课题研究初成之际，在马敏校长的亲自过问与促成，石挺处长领导的社科处同仁以及国际交流学院、外事处的多位领导和同事的全力支持下，我得到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对新拟中印比较课题研究的资金支持，于2009年2月再度赴印度考察和访问，得到T. R. Sareen 博士、Lalchungnonga 博士和Brij Tankha 教授和K. L. Shrimali 教授的帮助，走访了尼赫鲁纪念图书馆、印度国际交流中心、德里大学、贾·尼赫鲁大学、贝拿勒斯印度大学、塞兰坡学院、印度国立图书馆，并查阅和收集到关于殖民地时期印度妇女的图书资料以及印度独立之前、之后直至最新发表的一些期刊论文，其中《公元前600年至今的印度妇女作品》一书对补充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 and 了解相关研究动态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2009年暑假，在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前往该所和莱顿大学做短期研究。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不仅查阅和收集了大量研究资料，还同Max Sparreboom 教授、D. H. A. Kolff 教授、Tak-Wing Ngo 教授和Barend ter Haar 教授等著名学者就一些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交流访谈，深受启发和教益；同时，在著名的科恩图书馆，找到了19世纪印度著名女改革家潘迪塔·罗摩巴依·娑罗室伐底的名著《印度教高等种姓妇女》及其他一些著作，成为不可替代的原始资料之一。

当书稿初定之时，我有幸得到印度历史研究理事会(ICHR)的资助，于2011年2月又一次远赴印度，在德里、加尔各答和孟买等地的ICHR图书馆、尼赫鲁纪念图书馆及档案馆、印度国际交流中心图书馆、印度国家档案馆、印度国家图书馆、孟买大学图书馆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档案馆查阅并获取了诸多相关研究资料。在一个月的工作期间，我得到了ICHR主席Sabyasachi Bhattacharya 教授、前主任T. R. Sareen 博士、秘书长Israt Alam 博士、副主任S. M. Mishra 博士和孟买大学历史系主任T. R. Ghoble 教授莫大的关心和支持，ICHR的助理主任Rajesh Kumar 博士、ICHR图书馆副馆长Jyotsna Arona 博士、Dharmender Singh 先生和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ICSSR)加尔各答站的Narendra Nath 先生，也给予我热情帮助，在此深表谢忱。我还要感谢M. Thampi 教授为我写了很好的推荐意见，感谢我国驻印使馆的黄志刚先生，

他在他的职责范围内给了我必不可少的支持和帮助。

在成书之际，思及我记事以来教过我的各位老师对我的教诲，他们在治学态度、史学知识和研究方法上给了我莫大的教益。其中的黄振教授还亲自参加了出版社对该书的审稿工作。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尤其是世界史学科的同事也一直激励着我，而周柏青、庄万友、贺章容、王友群等诸位印度史同窗更是声气相通，不时给我以扶助。

所有这些指导、支持和帮助，使我刻骨铭心，缺一则此书难成。在此一并致谢。感恩之心，必当存留到永远。

学海无涯。当年以为其研究难度和范围相对有限的近现代印度妇女问题研究，一旦进入，才得知其内涵和外延之大，而笔者主观能力和客观条件的局限又何止一二，呈献在此的这部拙作之所及，只能是挂一漏万，谬误更是在所难免。笔者诚惶诚恐，静候各位前辈、同仁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此，我愿以这部拙作的出版祭奠我最亲爱的父亲和母亲的在天之灵。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负载沉重：传统印度社会中的妇女	(20)
一、历史上印度妇女的沦落	(20)
二、印度社会关于妇女的观念	(33)
三、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处境	(40)
四、妇女地位与传统印度社会的关系	(70)
五、中世纪妇女的不满和反抗	(81)
第二章 挣脱桎梏：踟蹰而行的早期社会立法及其实施	(91)
一、殖民地印度社会立法前的法律和立法者	(91)
二、19 世纪的几项重要社会立法	(101)
三、涉及妇女和家庭关系的其他社会立法	(143)
第三章 走向自立(一)：女子教育的艰难发展	(154)
一、传统印度社会的女子教育	(154)
二、19 世纪关于女子教育的不同看法	(162)
三、女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170)
四、医学教育和助产士培训	(201)
第四章 走向自立(二)：妇女就业的新动向和新问题	(209)
一、自由职业中的妇女：新天地和新困难	(211)
二、传统行业中的妇女：道路越走越窄	(221)

三、新兴无产阶级中妇女的处境和地位	(244)
第五章 群起奋争：妇女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259)
一、妇女的觉醒与个别抗争	(259)
二、妇女组织的出现与发展	(284)
三、妇女运动的兴起与开展	(292)
四、为统一民法而奋争	(314)
第六章 跻身政坛：民族运动中的妇女	(320)
一、妇女与民族运动	(320)
二、民族运动中的妇女	(332)
三、印度民族运动对妇女解放的影响	(372)
结论	(393)
一、殖民地印度妇女社会地位和角色的变化	(393)
二、妇女解放与殖民地印度社会的早期现代化	(402)
三、对影响殖民地印度妇女境遇改善的一些因素的分析	(407)
四、印度妇女解放道路的特色	(416)
参考文献	(421)

绪 论

一

在近代以来的印度，改变妇女处境并提高其地位受到众多社会改革者的关注，也是 19 世纪以来社会改革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近代尤其是现代以来，印度社会已经接受了甘地—尼赫鲁关于妇女通过参与公共事务以求获得自身解放的思想，并拥有一位女总理达 15 年以上。然而，在相关改革取得一些成就、妇女生存环境和自身素质大为改观的同时，妇女问题至今仍是当代印度诸多重大社会问题之一。

具有嘲讽意味的被标以穆斯林妇女的保护离婚权利法案和人所共知的穆斯林妇女提案于 1968 年通过，使穆斯林妇女在个人生活的有关事务上被排除在“印度刑事法”的适用范围之外；1985 年，围绕穆斯林私法之运用的沙·巴诺案件（涉及穆斯林的离婚赡养问题）之争议最后诉诸最高法院，却以富有的丈夫胜诉，对年过七旬的前妻不承担抚养费而告终。在这些事件中，妇女运动的反应和反对未能阻止事态滑向对妇女不利的结局。结果是穆斯林妇女的不平等地位不仅得到容忍，而且被打上了立法批准的印记。印度穆斯林妇女成为穆斯林男子加强教派认同的祭坛上，也被无论是国大党还是人民党的当权党派作为获取选票的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穆斯林学者 M·J·阿克巴曾试图对印度穆斯林男子力图保留穆斯林私法的过时形式作出解释。按照他的说法，印度的穆斯林感到“需要一种单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将它等同于一个单独的国家。一个少数人群固执地坚持其象征、特别是其宗教象征，因为那是认同的形式”^①。有意

^① Hem Lata Swarup, Saragini Prisani (ed.), *Wom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New Delhi, 1991, p. 149.

思的是，穆斯林少数人群所用的象征极有选择性：大多数与穆斯林男子支配穆斯林妇女有关。

于是，“宗教自由”已成为使妇女处于附属地位的口实，而著名的沙·巴诺案件是既得利益者企图剥夺妇女在世俗宪法下所享有权利的最新证据。社会在前进，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却希望妇女一直落后。今日印度的妇女虽然取得了基于世俗主义和依据一部世俗法律的正当地位，但印度各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却坚持妇女应处于传统地位。

不久以后，尽管现存印度法律自 1829 年以来就禁止萨蒂习俗，可是在 1987 年 9 月，年轻的寡妇鲁普·坎瓦尔被烧死在其丈夫的火葬柴堆上，成为印度教原教旨主义永久化了的罪恶。穆斯林妇女法案通过以后不久的 1986 年 2 月，在围绕巴布里清真寺的教派冲突中，成千上万的拉其普特人手握刀剑，其平素温顺的妇女走上斋普尔街头游行，反对政府在妇女运动——它再也不能对复兴主义死灰复燃保持沉默了——的压力下禁止她们享有成为萨蒂之光荣。

接踵而来的是媒体利用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来宣讲妇女的从属地位，尽管《摩诃婆罗多》中的角色德罗帕蒂曾发出十分“现代”的声音，在那个一夫多妻已非常流行而一妻多夫尚未完全消失的时代对父系家长制提出质疑。

尤其是随着 1989 年大选中国大党的失败，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已有所抬头的教派主义更显活跃。妇女在议会中的人数下降了。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议会中较大的妇女代表团属于被称作复兴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的力量。带有印度教教派主义色彩的印度人民党和锡克教极端主义团体阿卡利党都派出较多的女议员人数，而妇女解放的传统支持者——左派政党的女议员却很少。甚至在阿约迪耶(Ayodhya)持续进行的“Kar-Seva”运动中，妇女自愿者的数量都很可观。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攻击印度宪法中的世俗主义观念本身，教派狂热在印度人民党首领“索姆纳特到阿约迪耶之罗特祭”的觉醒中和“巴杰朗克冲锋队”的策应下被煽动起来，并试图捣毁巴布里清真寺。

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活跃于各种讲坛，颂扬像萨蒂这样的制度。宗教领袖为了寺庙和清真寺而战，为了琐事而挑起流血冲突。如果一名妇女被其他教派的男人强奸，全城都会燃起教派疯狂；但若是一名妇女被本教派的男人强奸，整个教派则作沉默的壁上观。原教旨主义者在妇女因嫁妆而被烧死或在宗教名

义下被迫卖淫时也保持沉默。

2002年,教派政党在古吉拉特显示了他们的能量。是年2月,穆斯林被指责袭击并焚烧一列前往阿约迪耶庆祝捣毁巴布里清真寺的客运列车,于是,对穆斯林的报复行动自列车被焚烧的次日开始。关于这一事件,阿密塔夫·高士写道:“在这场屠杀的余波里,日渐清楚的是,国家机器以及可能企业界的金融机构都屈从于煽动和支持暴民暴乱的行动。换句话说,维持社会秩序的两支最重要的力量,都准确地转向相反的目的:破坏和平和推动暴力。”^①引人注目的是,尽管没有被指控为焚烧列车,穆斯林妇女却成为这些“民族清洗”有意识的目标。印度女性主义学者迅即起而反对,她们谴责这些报复性杀戮的文章被刊载在《Manushi》、《瞭望》和《经济和政治周刊》等刊物上。在《恐怖的符号学》一文中,塔妮迦·萨尔卡尔概括了针对妇女的暴行:“人们能够继续叙述那些折磨和杀害婴儿和妇女的方式,但这里的要点是往往两种行为一起施行。那残酷的样式指出三件事。其一,妇女的身体是几乎无穷的暴力以无尽多样和花样翻新的折磨的对象。其二,她们的性器官和生育器官受到特别野蛮的摧残。其三,她们已经出生的和尚未出生的孩子也一道受到摧残,并在她们眼前被杀害。”^②

锡克教原教旨主义者,同其他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一样,正在持续要求撤销给予女儿的财产权,主张寡妇嫁给小叔子以便使土地财产留在父系大家庭内部。

各教派原教旨主义都主张使妇女永久居于屈辱和受损害的地位。对妇女的“隐秘伤害是以保留印度文化的名义剥夺妇女的教育、培训、就业、自尊和公民参与权的父系家长制本身所固有的,而公开伤害的形式则通常是否定其出生权、杀害女婴、夜间调戏、猥亵、强奸、索取嫁妆、烧死新娘、萨蒂习俗和否定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中的决策地位”^③。

印度妇女的地位和角色至今仍存在问题,正如2009年印度总统普拉蒂巴·

① Geraldine Forbes, *Women in Colonial India, Assays on Politics, Medicine, and Historiography*, New Delhi, 2005, p. 161.

② Geraldine Forbes, *Women in Colonial India, Assays on Politics, Medicine, and Historiography*, New Delhi, 2005, p. 162.

③ Hem Lata Swarup, Saragini Prisani (ed.), *Wom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New Delhi, 1991, p. 15.

帕蒂尔在印度第 62 个独立日前夕对全国的讲话中所说：“我强烈主张，必须向妇女提供更好的发展渠道和参与机会，并支持我们战胜社会歧视。这是她们的权利，妇女们应当通过自身奋斗争取这些权利。没有妇女的参与，真正的发展就没有根基，因为女性是社会赖以变化发展的轴心。”“我们这个社会还存在着不少陋习，这些社会陋习妨碍了我们专心致志的建设一个进步的国家。社会陋习不仅给家庭带来痛苦，而且侵蚀着整个社会的肌体，并导致经济资源被大量浪费。无论是巨额嫁妆，还是重男轻女、堕杀女婴，抑或是家庭暴力以及嗜烟、吸毒和酗酒，所有这些社会陋习必须从我们这个社会彻底根除。”

当代印度社会中妇女问题的存在，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历史，尤其是殖民地时期印度历史的发展状况。当代印度和国外社会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这一领域中做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二

妇女问题是在殖民地官员、进步人士和传统主义者争论妇女与现代两性关系时出现于 19 世纪的印度的。但是，一方面有许多关于妇女的论著问世；另一方面，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都还没有妇女的历史。由男人写的第一批历史，通常都注重赞颂古代妇女的“理想状态”。

西方学者也热衷于研究印度妇女的历史。美国作家凯瑟琳·梅奥的《印度母亲》(Mother India)被重印了多次，进入了美国的每一家图书馆。到 20 世纪 50 年代，它成为了解印度的重要来源之一。直到 70 年代晚期，人们仍在阅读它。梅奥在 1927 年时告知世界，印度是落后的，因为印度教管制性活动，造成其信徒孱弱、怯懦，不能支配他们自己。玛丽·戴利的《性别生态：激进女性主义的变形伦理学》(Gyn/Ecology: The Metaethics of Radical Feminism)，揭示了印度“妇女牺牲”的不同形式。戴利是《印度母亲》的赞美者，她认为该书是一份重要的女性主义文献，从而刷新了对凯瑟琳·梅奥的看法。

为了对抗这些流行但有缺点的记述，印度史学家知道，他们必须使用翔实的档案材料重写印度妇女的历史，第一步是发现和保存这些资料。

印度的妇女研究重视利用各种原始资料，注意收集和利用妇女运动领导人的自传和传记以及与这些领导人在世家庭成员的会谈。其他档案资料也都受到

研究者和机构的重视。早期妇女组织孟加拉妇女协会(Bangiya Nari Samaj)的记录已经散失,但加尔各答的报纸和在马德拉斯出版的妇女刊物《妇德》(Stri Dharma)却广泛地反映了这一协会的活动。孟加拉妇女教育联盟(Bengal Women's Education League)每年各次会议的记录和呈交年会文件的综述都存放于加尔各答的国立图书馆。孟加拉妇女联合会(All-Bengal Women's Union)至今仍然活跃并保存了珍贵的记录和报告,保存于加尔各答的关于其争论和中断表决的立法提案的孟加拉立法委员会文集(Bengal Legislative Council Proceedings, 1921—1935)是这一研究的宝贵资料。此外,当时的多种报刊(有些针对专业研究人员,另一些针对一般读者)也可以参阅。进行妇女研究的印度历史学家针对特定题目,对被研究历史时期的原始资料进行考察和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关于妇女的书籍,大都庆贺她们在民族独立斗争中取得的政治成就。尼罗·德赛的《现代印度的妇女》(Woman In Modern India, 1957)是第一部学术性著作和第一部女性写作的妇女史,它包含了对印度社会的批评。《走向平等:印度妇女地位委员会的报告》(Towards Equality: th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India, 1974)是德赛的又一部著作,它客观地评估了妇女的社会地位。这一报告不仅对历史学家将如何看待印度独立以来直到70年代的妇女历史有所影响,它还提出了未来研究的议题。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史学家集中致力于发现和保存妇女的记录,努力使妇女生活为人所知,并记录了非精英妇女的生活。

印度的第一个妇女研究规划也在70年代开始,以妇女的生活、地位和境况作为研究课题。《走向平等》一书的论点即认为大多数妇女没有享受到“宪法给予她们的权利和机会”,对该项目有直接的影响。该委员会秘书维娜·马宗达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一著作作为正在不断出现的妇女研究项目提出了课题,即促使政界人士为争取妇女的福利作出努力,说服社会科学界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研究门类,并重启关于妇女问题的争论。80年代初,印度第一次全国妇女研究大会召开,还举行了针对一些具体主题的多次地方性、地区性和全国性的会议。在为男女平等和社会公正而努力的热情驱使下,这些课题使印度政府日益关注妇女的发展。印度国民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年—1985年)专设一章来谈关于妇女与发展的问題。1986年,议会采纳了关于教育的国家政策,其中有论及妇女平等的一个部分,承认妇女研究能在转变社会中发挥作用。其

后，大学拨款委员会(UGC)组建了一个常任委员会，以将妇女研究引入有关教学科研机构及相关领域。到2003年，印度在这一研究领域获得资助的总共有34个中心和4个单位。

印度的妇女研究项目还与高等院校的教学活动相联系。加尔各答的贾达夫普尔(Jadavpur)大学就开设了妇女研究方面的补习课程。从1998年起，该校推出妇女研究方面的补习课程，专为需要了解该研究领域最新发展动态的高校教师设置。《妇女研究丛书》(Stri Abhyas Shreni)则是由尼罗·德赛和乌莎·塔迦尔构思和主编的一套妇女研究基础知识的教科书。《妇女研究丛书》的开端是90年代中期在SNDT女子大学举办的一个研讨班，内容涉及用地区语言研究妇女文献的可行性，参加者均为参与妇女研究的学者。与会者决定编写一套短篇作品的丛书，用直白的大专水平的古吉拉特语为妇女研究的学生和教师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写作。为时三周的研讨班还设计把妇女研究加入现有课程表，这样的课程意在使学生注意妇女生活，教给他们如何用批判的眼光读教科书。课程设计者坦言，其政治目的是培养能以更有用的方式“重铸即再产生”社会现实的教师和研究者。

70年代以来，在发现、收集、整理和保存对印度妇女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即不属于传统档案材料组成部分的回忆录和照片方面，有了新的开始。从舒达·马宗达的生平开始，然后是曼莫希妮·祖希·萨迦尔的回忆录，最后还找到了19世纪的女医务人员海玛巴蒂·森留给儿子的笔记本。作为把注意力转向最近20年的回忆录的史学家之一，杰拉尔丁·福卜斯为印度国民军上尉拉克希米·萨迦尔的回忆录写了导言，从一些妇女那里收集了简短的回忆录。这些为数不多的出版物为人们了解历史增添了一个妇女个人层面的资料来源。

到80年代，学者们利用新史学来重新解读和重新使用现存资料，并考察新发现和保存的记录，成果斐然。例如，苏希·塔鲁和K·拉丽塔主编的文集《公元前600年至今的印度妇女作品》(Women Writing in India, from B.C. 600 to the Present)翻译并编辑了公元前600年以来的妇女作品。其他史学家也编辑和出版了所发现的妇女作品。杰拉尔丁·福卜斯对舒达·马宗达、曼莫希妮·祖希·萨迦尔的回忆录和海玛巴蒂·森留给儿子的笔记本等所做的工作，塔尼迦·萨尔卡尔翻译并研究了对罗什孙达里·德维的回忆录，利姆里·巴塔恰里耶则翻译了比诺迪妮·达西的作品。这些著作复原了妇女的作品，并对历史上

起作用的各种因素、社会文化差异等进行思考。在史学家和档案学家重新定义档案,并保存妇女记录的工作方面,C·S·拉克希米创办的机构值得一提。

C·S·拉克希米是设在孟买的档案资料兼研究机构——妇女研究音像档案馆(Sound and Picture Archives for Research on Women)的创始人。80年代晚期,女权主义学者开始谈及需要一个专门为妇女研究而设的档案馆,它将收集资料并力图成为“一股自觉的力量”。从一开始,妇女研究音像档案馆又是一个努力获取包括从妇女的私人文件、日记到照片及文字记录的资料,并指导口述历史的研究机构。

除了对回忆录感兴趣的出版商如印度第一家女权主义出版商迦梨妇女出版社(Kali for Women and Stree)以外,现有的图书馆和组织也关注它们的保存。例如,孟买的妇女研究音像档案馆正大力收集有关妇女的文件,拥有大量藏书的加尔各答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和马德拉斯的罗阁·穆提亚研究图书馆(Raja Muthiah Research Library)等已经决定要设法收集妇女的记录。

口述历史是保存妇女对其生活记述的另一途径。最大的口述历史项目已经由尼赫鲁纪念博物馆及图书馆(Nehru Memorial Museum and Library)启动,内容包括男子和妇女的解放斗争。C·S·拉克希米的妇女研究音像档案馆则会见并记录那些是“历史创造者”但未曾叙述过其经历的妇女。除了制作磁带供未来的研究者使用之外,该馆又制作了一些带有面谈记录和照片的小册子,如达里特种姓女权主义作家乌尔米拉·帕瓦尔写的《Amhini Itihas Ghadawala》和科学家尚杜·古尔纳尼的《世界:我的实验室》(The World as My Laboratory)。爱好艺术的C·S·拉克希米还把其他史学家忽视了的音乐家、歌唱家、艺术家、雕塑家和演员包括进来。该馆已将这些小册子翻译成7种地区性语言。

这是一个拉克希米解释为“将不仅说出缄默者的声音,而且将导向交流、共享和互动的”工程^①。在选择作为对象的不同种姓和教派的妇女时,和在组织一个讨论教派主义、暴力与妇女关系的研讨会来回应阿约迪亚暴力事件和随后的暴乱时,妇女研究音像档案馆都采取了一种反对迫害妇女的政治立场。

针对印度大学中的研究生还大多得不到印度妇女历史理论基本教科书的情形,有两家出版商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位于加尔各答的女性主义出版社已启

^① Geraldine Forbes, *Women in Colonial India, Assays on Politics, Medicine, and Historiography*, New Delhi, 2005, p. 166.

动出版一套学生丛书，名为《女性主义理论》，被说成是“关于女性主义基本概念的手册”。迦梨妇女出版社约请部分学者来开发一套涉及种姓、就业、嫁妆和中介等论题的“对印度女性主义的争论”丛书。印度各史学学派，无论是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剑桥”的，还是“低层”(Subaltern)的，无一置身于政治之外，也无一对女性主义观点热忱相待。在这些学派的用语、期待和议程中，很少提出妇女史项目。

由于妇女的地位和处境在当代印度社会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与西方相比，印度妇女研究同社会政治实际的联系十分紧密。

同美国大专院校的女性主义学者争取在其本科生专业和研究生学位中引入妇女研究形成对照的是，推动印度类似研究立项的是一些现实问题。库穆德·沙尔玛评论说，尽管妇女研究的宗旨在最初一些年份没有得到清楚的界定，但与那些研究项目有关系的人们希望改变妇女问题研究的学术传统原则，而注重对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在印度，妇女研究的学位项目少于美国的，但各妇女研究中心做了大量工作，试图把妇女研究的资料和关于妇女的观点加入到现有课程和研究项目中去。与美国相比，印度的妇女研究与现实问题和行动保持了更紧密的联系。在大学拨款委员会要求妇女研究项目成为“社会工程学的工具”的同时，妇女研究也受到妇女运动的影响。在1996年的伯克郡妇女史会议上，塔尼迦·萨尔卡尔谈到写妇女历史同政治现实之间的密切关系。由于曾经参加过70年代的抗议运动，史学家了解了关于妇女状况的第一手材料，体验并分析了女性亚文化。随着“印度教权利”的呼声在80年代兴起及其对妇女问题说法的操控，许多相关学者都发现自己已陷入关于如何陈述历史的论争中。按萨尔卡尔的说法，妇女史学家被拉进了处于拥有权力和保持局外公允之间的两难局面。她们生活在一个不可能回避其学术活动之政治和社会后果的世界里。

最重要的任务是关注产生女性主义学术的政治经济环境。近年来有三部出版物聚焦于学者们所称的“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面临的强劲挑战”^①。当大学拨款委员会宣布它将妇女研究重新命名为“妇女和家庭研究”的项目时，已经承受着资金、大学结构、研究平台和政治环境等方面负担的这一学界感受到了新的压力。在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面临的问题中，梅特列依·克利希那拉杰又加上

^① Geraldine Forbes, *Women in Colonial India, Assays on Politics, Medicine, and Historiography*, New Delhi, 2005, p. 168.